

“中国电影年”的三部代表作

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

1930 年代,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电影界进步人士协同摄制了一批宣扬反帝反封建影片,即“左翼电影”。根据夏衍等人的确认,当时总共产生了 74 部左翼电影。这一时期的左翼电影,既肩负着中国共产党夺取电影文化阵地的任务,也是一场促进电影艺术发展的电影文化运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群众爱国抗日情绪高涨,民族矛盾加深,电影观众对老一套国产的“火烧片”、“言情片”、“伦理片”失去兴趣。

1933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筹备组建的“党的电影小组”正式成立。电影小组由 5 人组成:夏衍为组长,钱杏邨(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为组员。电影小组直属中央文委领导。其中,钱杏邨、石凌鹤、司徒慧敏是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夏衍是 1927 年“四一二”事变后加入党组织的,王尘无在 1930 年入党。

在苏联电影理论“电影武器说”的启迪下,“党的电影小组”通过原创剧本、输入干部等方式,保证了左翼影片的拍摄,促进了左翼影片的诞生。比如,为了加强各个影片公司的左翼创作力量,“党的电影小组”将“左翼剧联”盟员及多位新文艺工作者,陆续介绍参加到各个电影公司中去,如沈西苓、周伯勋、郑君里等。同时,电影小组自行创作具有进步内容的电影剧本,在 1932 年为“明星”、“艺华”、“联华”写出了第一批反帝反封建的电影剧本,如《狂流》(夏衍)、《三个摩登女性》(田汉)、《民族生存》(田汉)、《中国海的怒潮》(阳翰笙)等。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介入,新兴左翼电影开始宣扬普罗意识,与国民党展开宣传战。

1933 年被称为“中国电影年”,是中国电影的转变年,更是左翼电影的丰收年,进步影片接二连三地上映,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左翼电影人创作的大量精品力作中,有 3 部电影值得一提:《狂流》《上海二十四小时》《姊妹花》,它们分别代表了左翼电影运动开端的标志性作品、最高艺术水准与最佳票房纪录。

《狂流》(Raging Waves)是明星电影公司出品的第一部左翼电影,是夏衍受命进入电影界后创作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剧本作于 1932 年,署名丁一之,1933 年由“明星”拍摄成无声电影(程步高执导,3 月 5 日上映),署名丁谦平。影片在演绎广大民众 1931 年与洪水搏斗的抗洪过程中,嵌入了一个农民群众与地主阶级激烈对抗的故事,直击



《狂流》是左翼电影运动开端的标志性作品



《上海二十四小时》代表了左翼电影最高艺术水准



《姊妹花》是左翼电影获得最佳票房纪录的作品

反封建的核心主题。影片在上海首映时,受到观众的欢迎和评论的赞扬,认为“在国产影片当中,能够抓取现实的题材,而以正确的描写和前进的意识来制作的,这还是一个新的纪录”,是“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

《上海二十四小时》(Shanghai over 24 Hours)是夏衍推出《狂流》后的又一神来之笔。剧本作于 1932 年,署名丁一之,1933 年由明星影片公司拍摄成无声电影(沈西苓执导)。由于国民党电影检查的阻挠,经当局删剪后于 1934 年底公映。影片以一个童工的生死为情节发展的“草蛇灰线”,串联起贫富悬殊的 24 小时经历,用对比的方式交错描述资本家的骄奢淫逸与劳工阶级的走投无路。郑正秋曾说,“这是一部国产影片中具有世界性的作品”。

郑正秋编有的有声电影《姊妹花》完成于 1933 年,于 1934 年除夕(2 月 13 日)首映。《姊妹花》根据郑正秋创作的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是其家庭伦理情节剧编导的巅峰之作。影片通过一出家庭伦理悲剧,表现了阶级的对立是如何决定了人们绝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和命运,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是如何侵蚀人们的灵魂,扼杀着人类的骨肉伦常。在左翼电影运动的助推之下,郑正秋在这部电影中触及了乡村破产、军阀当政、贫富悬殊等尖锐话题,引起观众共鸣。该片甫一登场,即取得了首轮影院连续放映 60 天的成绩,是国产影片市场有史以来第一部高票房电影。这部电影后辗转在全国 18 个省、53 个城市,以及香港、南洋群岛 10 个城市放映。

1933 年最后一天,在《晨报·每日电影》的固定栏目《每日座谈》上,夏衍等人以“每日电影”同仁的名义,发表了年终回顾,并推选了“今年的五张最好的中国片”,如下:



《春蚕》



《都会的早晨》



《小玩意》



《脂粉市场》



《母性之光》